

政府行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以西安市秦岭北麓为例

顾铮鸣, 陈海, 王晓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以西安市秦岭北麓各区县为例, 从政府行为对土地供给、农业资本的支持以及政府行为自身 3 个方面初步探讨了政府行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 由于政府政策支持, 农业规模化生产所需的大量土地得到有效供给, 资金得到有效配置, 而区县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推动的原因, 是出于对发展地方经济及政治晋升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 土地流转; 政府行为; 农业产业化; 秦岭北麓

中图分类号 S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13)12 - 05550 - 03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Behavior to Land Circulation: in the Case of Xian, North Qinling Mountain

GU Zheng-ming et al (School of City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Abstract Taking towns in North Qinling Mountain, Xi'an as example, effects of government behavior on land circulation were discussed from land supply, agricultural capital and government behavior itself.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e to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y, large land for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effectively supplied, the capital is fully provided,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land circulation actively is strongly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Land circulation; Government behavior;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North Qinling Mountain

随着经济发展,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农村劳动力就业向第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加快, 农村土地出现了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李克强指出: “只有减少农民, 才能富裕农民。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 农村居民人均占有量相应增加,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 增加农民收入”^[1]。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时下被认为是实现农业资源最优配置, 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已有研究指出, 土地的自由流转能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 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积极作用^[2]。

目前, 对土地流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以及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时的行为决策上, 例如丁关良从物权角度提出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法律问题^[3]; 王文峰从经济动因角度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 认为土地流转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4]; 周强等从农户家庭出发揭示了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因^[5]。然而长期以来, 理论界研究主要停留在微观层面, 而对其所赖以存在的宏观环境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

实际上当前在许多地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多是行政力量推动的, 甚至采取强力措施推进土地流转, 这显然在微观层面上难以进行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促使学界对土地流转进行重新认识, 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需要满足哪些外部条件? 土地流转各方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角色又该如何界定? 事实上, 在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框架下, 如何进一步协调家庭经营激励机制和农地流转的规模经济效益,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一道难题^[6]。

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位于我国大陆腹地的关中盆地, 地处 107°40' ~ 109°49' E, 33°39' ~ 34°45' N,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明。西安市面积 9 983 km², 占陕西省总面积的 4.9%, 下辖新城、碑林、莲湖、灞桥、长安、未央、阎良、雁塔、临潼 9 区, 蓝田、户县、周至、高陵 4 县。市区南部处于秦岭山区和丘陵地带, 北部为平原, 地势总体上南高北低, 平原面积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3.7%, 土地肥沃, 山川壮丽。

西安市现代农业示范园位于秦岭北麓环山路及其以北地区, 南横线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涉及到蓝田、长安、户县、周至 3 县 1 区, 是县市区连接秦岭的重要过渡空间。其中, 长安区 2011 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区, 根据长安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总体规划, 要将示范区打造为现代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农业生产的样板区。因此, 在打造秦岭北麓现代农业示范园的过程中, 研究政府行为对土地流转以及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有其代表意义。

2 政府行为对土地流转的作用机制

根据道格拉斯·C·诺斯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制度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 适宜的制度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尽力推向上限, 反之则会使经济活动呈现收缩衰退的趋势^[7]。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一种促进农村农业经营产业化的方法, 其最终能否有效发挥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作用, 除了农户自发流转, 提高经营绩效之外, 其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法。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对于土地转出方和土地转入方而言, 地方政府及村集体就更多充当了“交易中介”的作用。因此, 如何使用这种交易资源, 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 从而增进社会的总效益, 应当成为政府决策时考虑的重点。

政府通过积极的城市发展和城乡规划政策, 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 使得各级城镇和农村在城乡地域中呈现出土地利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03, 40901093);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0YJC790017); 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11JK0744)。

作者简介 顾铮鸣(1989 -), 男, 安徽亳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功能变化, E-mail: guzhengming@ 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13-04-03

用功能不同、分布有序、服务都市的农业景观格局;同时为非农产业提供劳动力,为涉农机械、信息、技术等提供需求;政府再通过相应的制度、融资等支持手段,使工农业部门之间及城乡地域之间的要素形成合力,实现工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重新组合好利益再分配,促进农村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及城市化,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7]。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作用机制示意图 1。



图 1 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作用机制示意图

3 政府行为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影响分析

3.1 对土地供给的影响 土地的自然供给即自然赋予的土地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它不会随土地价格(地租)的变化而变化^[8]。在土地的自然供给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和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镇化,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迅速减少,可供流转的土地数量因此增加,由此,政府可以调配的农地资源也不断增加。

根据西安市“十二五”规划,规划目标是在全市建设 13 个农业示范园、3 个农业展示中心和 1 个物流中心,观光农业发展工程是要使旅游观光面积达到 2.33 万 hm^2 以上,规模以上园区 100 家;而根据下设区县“十二五”规划项目,蓝田县“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现代农业项目有 13 个,其中白鹿原观光农业建设面积就达到 2 133.33 hm^2 。

长安区“把土地流转作为扩大现代农业发展规模的关键环节,采取出租、转包、土地托管、互换、转让等形式……统一招商项目、统一土地流转、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基础配套”计划进行高速度土地流转。2012 年长安区秦岭北麓农业科技示范园已经落户企业 13 个,流转土地 600 hm^2 ,正在规划中的秦岭花卉园也已吸引 6 家企业入驻,流转土地 56 hm^2 。规划还提到,为配合现代农业示范区产业规划布局,到 2020 年内至少要流转 2 333.33 hm^2 土地,流转后的土地将从事有机粮食基地、蔬菜、果品基地、休闲农业观光等用途。

户县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在秦岭北麓建设 3 333.33 hm^2 旅游观光农业带,并准备以葡萄和蔬菜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户县计划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进行农业开发,到 2015 年葡萄种植面积要达到 2 333.33 hm^2 ,建设 20 hm^2 以上规模示范园 10 个,3.33 hm^2 以上规模示范园 30 个,并以乡镇为单位逐一下达设施农业和葡萄产业发展任务指标。

周至县农业“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是围绕“都市农业”发展理念,2014 年底前建成周至县秦岭北麓杂果林带 6 666.67 hm^2 (比 2010 年 5 066.67 hm^2 增加 1 600 hm^2),名优果品基地 2.67 万 hm^2 (比 2010 年 2.14 万 hm^2 增加 0.53 万

hm^2),绿色蔬菜基地 1 万 hm^2 ,周至县政府以猕猴桃产业为主导,土地集中流转,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进行农业生产,目前周至猕猴桃加工企业 38 家,全县有 5 万户农户从事猕猴桃生产,占全县总农户的 40%,总人口的 25%,猕猴桃专业合作组织 120 多个。

结果显示,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与西安市“十二五”规划所拟定的部分相比,秦岭北麓各区县政府对于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并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具有更加强烈的意愿。

表 1 秦岭北麓现代农业示范区项目区接乡统计面积 km^2

县(区)	乡(镇)	面积	县(区)	乡(镇)	面积
周至县	竹峪乡	12.74	长安区	滦镇	38.80
周至县	广济镇	39.36	长安区	五星乡	25.70
周至县	翠峰乡	16.28	长安区	引镇	28.40
周至县	九峰乡	30.64	长安区	王莽乡	37.45
周至县	楼观镇	54.59	长安区	太乙宫镇	14.02
周至县	马召镇	33.51	长安区	子午镇	17.98
周至县	集贤镇	32.57	长安区	东大镇	25.41
户县	蒋村镇	37.44	长安区	杨庄乡	11.81
户县	天桥乡	25.02	蓝田县	安村乡	44.58
户县	余下镇	28.57	蓝田县	蓝关镇	51.97
户县	庞光镇	30.03	蓝田县	焦岱镇	32.69
户县	草堂镇	39.14	蓝田县	史家寨乡	22.10
户县	石井镇	27.92	蓝田县	汤峪镇	27.06
长安区	王曲镇	43.20	蓝田县	小寨乡	17.14
长安区	杜曲镇	39.13	蓝田县	前卫镇	47.58
长安区	黄良乡	19.44			

注:数据来源于 2012 年西安市农业委员会资料。

3.2 对农业资本的影响 农业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 3 种,该研究仅讨论货币资本的情况。政府对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支持对于农业资本同样带来了比较大的变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府对农业产业园的投资快速增长和对农业组织经营门槛的降低。对于土地流入方而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必然会导致对农业资本的大量需求。

蓝田县“十二五”重大项目规划中的 13 个农业项目,总投资 364 600 万元,其中政府、群众筹资 184 400 万元,企业自筹资金 180 200 万元,非企业资金投入占到了 50% 强。

长安区 2010 年被农业部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得到了国家的扶持。示范区计划总投资 400 706.84 万元,其中粮食产业总投资概算为 29 007.8 万元(国家扶持 17 404.7 万元,地方扶持 5 801.57 万元,群众自筹 5 801.57 万元),蔬菜产业总投资 286 808 万元,畜牧产业总投资 84 891 万元(国家财政 30 000 万,地方财政 10 000 万,企业自筹 44 891 万),涉及到秦岭北麓西安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区有杨氏万亩有机农庄建设投资 5 492.2 万元。在农业示范区内,根据秦岭北麓环山路农业科技观光园产业带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流转土地 414.13 hm^2 ,总投资在 115 000 万元以上,其中企业投资超过 70 000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61%。

户县政府对于规模化农业种植的资金支持是通过农业补助实现的。在全县范围内,集中连片 13.33 hm^2 以上日光

温室(半地下式)的,省财政每公顷补助3万元,市财政每公顷补助1.5万元,县财政每公顷补助3万元,每公顷共补助7.5万元;集中连片13.33 hm²以上大棚瓜果菜的,省财政每公顷补助11 250元,市财政每公顷补助5 625元,县财政每公顷补助11 250元,每公顷共补助28 125元。对于设施农业示范园,新增大棚6.67 hm²以上,连片总面积达到20 hm²以上的示范园,每个示范园奖补10万元,其中,土地流转补助2万元;对新增13.33 hm²以上,连片总面积达到33.33 hm²以上的示范园,每个示范园奖补20万元,其中,土地流转补助4万元;对新增20 hm²以上,连片总面积达到66.67 hm²的示范园,每个示范园奖补30万元。

周至县在打造名优果品基地的过程中,确立了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计划。计划总投资30 628万元,争取项目投资7 054万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对企业实行土地集中流转,每公顷补助4 500元,对日光温室每公顷补助6万元,标准化大棚每公顷补助2.25万元。

可以看到,西安市秦岭北麓各区县在进行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政府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大,而政府投资中除了长安区作为国家农业示范区因而中央投资额度较多外,更多是地方政府出资。区县政府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倾斜势必会影响金融信贷机构对相关农业组织信贷量的增加。

4 从政府行为角度理解土地流转

4.1 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宏观条件 农业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农业问题,因而其农业政策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也不同^[9]。

在工业化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给工业化筹集资金,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在此背景下,农业生产率受到抑制,产生粮食问题。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有强化农业技术开发、革新生产制度等(如我国建国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杂交水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农业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小,工业劳动生产率上升速率远快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农业劳动力也在市场规律下转向其他部门。这一阶段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因为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政府也无力补助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相反,为了保证工业化人口,“廉价提供农产品”政策依然存在。速水佑次郎称之为“农村贫困问题”,并认为农民相对收入下降现象在中等收入国家广泛存在^[9]。如果不调整农业结构,农民收入就会停滞,政府政策目标是如何防止农民收入减少。在发达国家,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是普遍采取农业保护政策,如价格补贴等。

综上所述并结合中国国情,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以下时,此阶段优先考虑的应该是粮食问题,应该巩固以农户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如果一味推进土地流转可能适得其反。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工成为常态时,推进土地流转,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才能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

段。2010年西安市GDP达到3 241.49亿元,人均GDP 7 212.41美元,三大产业结构占GDP比重为4.3:43.5:52.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2 244元和7 750元,初步达到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临界点。

4.2 政府行为影响农地流转的逻辑分析

4.2.1 政府行为的外部因素。政府的宏观调控为维持国内经济平稳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因素变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日趋加大。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当年就投入4万亿人民币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有人测算,2003~2009年,我国投资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从2003年的35%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69%,投资率也是不断上升^[10]。“4万亿”导致了2个直接后果:一是私企对所谓“国进民退”的担心,二是社会对通胀的担忧。再加上国家近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无论是从减少流动性过剩出发还是从资本自身保值增值出发,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投资领域。2010年长安区秦岭北麓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中提到:“现阶段房地产市场、股市持续疲软,而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从而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现代农业”。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方面进而推动土地流转的时候,存在着很强的目的性。

4.2.2 政府行为的内在因素。发展经济是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也是我国干部选拔考核的主要依据,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上级政府赏识以获取更大的政治晋升机会,也强烈希望发展地方经济^[11]。上文指出,国家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是出于当前阶段宏观经济形势需要,那么地方政府对于社会资金进入农业的欢迎态度就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与家庭承包相比,地方政府能够从农业企业那里取得税收,获得财政利益;通过建设成片的农业产业园,地方政府可以得到上级政府的赏识,获得政治利益。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例如2011年户县政府文件明文规定:为了确保全面超额完成全年设施农业发展和葡萄产业带建设任务,县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与各乡镇、各部门经济目标任务同步考核。对工作成绩显著的乡镇给予2万元奖励,其中1万元奖励乡镇领导、1万元奖励乡镇干部及村干部;对未完成任务的乡镇在全县予以通报批评,且年终不能评为目标责任制管理一等奖。

5 结论与讨论

从政府行为角度,首先从土地供应和资金支持方面考察政府行为对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影响,然后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考察了农地规模化流转所需要的宏观条件和进行流转时政府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以土地流转为前提,而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又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土地供应方面,西安市秦岭北麓各区县都推行“一站式”土地流转,流转力度之大超过了市政府的预

位于金衢盆地地区,开发历史较长,城市群发育良好,但是武义县与磐安县发展水平较低,使得区域内仍呈现较小的空间分异;浙西南地区的区域空间分异最小,区域内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相对均衡,但是其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为 -0.3478 ,仅略高于全省低水平区的均值,表明该区域总体综合发展水平处于落后态势,呈现低水平的均衡发展特征。

3 结论

笔者把因子分析方法、分异指数评价法与 GIS 空间分析工具相结合,系统分析了浙江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空间分异特征,为浙江省县域综合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提供了实证数据和可视化分析结果。

基于浙江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建立“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目标,提出以下建议:

(1) 浙西南地区综合发展水平与其他区域差距较大,应加强对该区域的扶持力度,通过生态补偿、财政支付转移等方式保障其发展,并探索跨越式发展道路,尽最大可能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均衡省内区域发展。

(2) 推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依靠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及舟山群岛新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政策优势,提高环杭州湾地区和温台沿海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减小区域内部差距,协调发展金华—义乌都市区,提升浙中地区整体综合发展水平,尤其是武义、磐安 2 县的发展水平。

(3) 努力发展浙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与中心县域,提升衢州、丽水 2 市市辖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缩小衢州、丽水“两核”与其他核心城市间的差距。

(上接第 5552 页)

期,完全可以满足未来数年农业公司对于土地的需求;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投资在相关农业项目中占有很大比重,并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拨款,同时为落户的农业经济组织给予政策优惠和补贴,为它们提供了有力资金保证。

研究还认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大规模土地流转才能成为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的途径。政府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同时受到外部和自身两方面的影响。外部因素即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认为有必要对社会闲散资金进行疏导;内部因素即地方政府在财税收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对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有着强烈意愿。

当然,该研究的分析还是初步的。由于相关资料掌握不足以及个人见识有限,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政府行为作用于土地流转的完整模型,也没有从土地利用功能的角度讨论未来土地流转的趋势,更没有从地理空间上表达出政府行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情况。对于上述问题,还有待在将来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 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J]. 求是, 2010(11): 3-15.

参考文献

- [1] 杨开忠.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J]. 经济研究, 1994(12): 28-33.
- [2] 周玉翠, 齐清文, 冯灿飞. 近 10 年中国省际经济差异动态变化特征[J]. 地理研究, 2002, 21(6): 781-790.
- [3] 蒋国富, 刘长运. 河南省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J]. 经济地理, 2008, 28(4): 636-639.
- [4] 唐礼智. 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原因探析[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19(6): 50-54, 100.
- [5] 潘竟虎, 张佳龙, 张勇. 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 ESDA-GIS 分析[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42(6): 83-87, 91.
- [6] 周杜辉, 李同昇, 哈斯巴根等. 陕西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机理[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2): 205-214.
- [7] 曾永明, 张果. 基于 GeoDA-GIS 的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0, 22(4): 52-58, 76.
- [8] 白永平, 李建豹. 基于 ESDA 的区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以兰新铁路辐射带为例[J]. 经济地理, 2011, 31(7): 1057-1063.
- [9] 胡良民, 苗长虹, 乔家君. 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时空格局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02, 21(3): 268-274.
- [10] 王海敏, 陈钰芬, 翁梅梅. 浙江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06(2): 127-129.
- [11] 张小军, 李植斌. 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及对策[J]. 经济论坛, 2008(12): 21-23.
- [12] 吴丽, 刘霞, 吴次芳. 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演化实证研究与 R/S 分析[J]. 经济地理, 2009, 29(2): 220-224.
- [13] 王丽娟, 胡韵, 刘玉, 等. 近 30 年浙江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动态研究[J]. 浙江农业学报, 2011, 23(4): 833-839.
- [14] 余鑫星, 官少颖, 吴永兴. 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统计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3): 27-32.
- [15] 浙江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浙江统计年鉴 2012[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 [16] 杭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 杭州统计年鉴 2012[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 [17] 衢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衢州调查队. 衢州统计年鉴 2012[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 [18] 舟山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舟山调查队. 舟山统计年鉴 2012[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 [19] 汪冬华. 多元统计分析与 SPSS 应用[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206-226.
- [20] 姚洋. 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佃市场的发育[J]. 中国农村观察, 1999(2): 16-21.
- [21] 丁关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对策建议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 法治研究, 2009(8): 12-19.
- [22] 王文峰. 从主体利益角度透视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J]. 生产力研究, 2005(10): 45-46.
- [23] 周强, 夏显力, 姚芬. 影响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分析——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J]. 广东农业科学, 2011(11): 193-195.
- [24] 朱伟方, 程培埏.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的宏观条件——以江苏省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12, 40(6): 383-387.
- [25] 罗雅丽, 李同升. 制度因素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J]. 人文地理, 2005(4): 47-86.
- [26]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01.
- [27] 速水佑次郎. 农业经济论[M]. 新版.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131-156.
- [28] 沈利生. 从投资比重上升看经济增长质量[J]. 宏观经济研究, 2011(1): 25-29.
- [29] 郭庆旺, 贾俊雪. 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J]. 管理世界, 2006(5): 19-25.
- [30] 林亮景. 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角色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2(4): 2334-2335, 2388.
- [31] ZHANG C C. The Major Problems and the Governmental Role in Chinese Rural Land Transfer[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1, 3(7): 62-65.
- [32] 李江南, 宋杨. 征地中农户与地方政府农户利益补偿量的博弈理论分析[J]. 内蒙古农业科技, 2010(3): 4-6, 30.